

著书者说



(清)乾隆妃梳妆图(局部) 选自《中国历代仕女图集》

镜子是凝固的历史

——《鉴若长河》的细节导读

□ 霍宏伟

2017年11月,拙作《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几个月来,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回首写书历程,虽然充满艰辛,却也不乏苦中作乐,其乐融融。

我一直将《鉴若长河》与《洛镜铜华》视为姊妹篇。记得四年前,由我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长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下册)历经三年写作,终于出版了。在完成这部铜镜著作的编撰之后,我时常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在编书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并试图去解决。于是,利用《鉴若长河》一书较为灵活、自由的叙述模式,我那些依旧活跃的铜镜研究思维有了任意驰骋的广袤空间。

在以往研究中,关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圆镜,有学者认为是铜镜,有人说不是。笔者在编撰《洛镜铜华》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在经过详细论证之后,决定不收收这面铜圆镜。这些考证文字当时无法写入《洛镜铜华》,最终在近出版出的《鉴若长河》之《金村王鉴》中有所体现。

西汉长安城遗址是否出土了铜镜?有学者认为城址内未见铜镜。我通过大量的资料检索,发现该城址内外曾出土了一些铜镜残片,由此引发了我较为深入的思考,即铜镜与古代都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考虑,因为大家关注的都是形制完整、纹饰精美的铜镜,对于铜镜残片一般不屑一顾。我以为,作为考古学者,我们不仅应该重视铜镜纹饰的内容题材与精粗程度,更应关注镜子的出土信息及其学术价值。这就是《鉴若长河》一书中《耕人犁破官人镜》专题的由来。

如何通过铜镜来研究大历史?我的研究思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小专题,长时段,将铜镜作为切入点,中国历史设定为落脚那。把铜镜这样一种古人日常使用的“蕞尔小物”,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如通过对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内外两座汉墓出土铜镜的分析,揭示出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这种研究思路仿佛徜徉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入口极小,进去之后感觉境界很大,出来后回味无穷。另一方面,本书并非按传统金石学的探讨路数,而是在考古学视野下进行镜学研究,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作为目标,把铜镜与古人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复原镜鉴在古人的生活场景中的位置。正所谓,从单纯的器物把玩鉴赏上升到物质文化史的高度来探究。

所以,在上述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下,《鉴若长河》一书的篇目设计有别于以往诸多铜镜著作。通过写作,我发现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跨界杂糅、整合引领。它以考古学为根基,试图熔文物、历史、文学、艺术于一炉,整合与铜镜相关的各类资料,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家乡洛阳吃的烩菜。这种文

体看似信手拈来,实为投襟见肘,需反复锤炼才行。

有人问我是如何走上铜镜研究之路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促成。具体而言,一是天时。我最早接触铜镜实物是在1986年暑假,当时我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158厂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了汉墓的发掘工作。在一些汉墓中,清理出铸造精美的铜镜,大多是日光镜、昭明镜。1996年,我跟随蔡运章先生编撰《洛镜铜华》。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书没能出版,但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铜镜的论文。2010年,我将未出版的铜镜书稿、资料从洛阳全部运回北京。2013年,与同道历经三年辛勤耕耘,《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2017年,《鉴若长河》问世。回首30多年来,在有意无意间,我能多次与铜镜结缘,并陆续有学术成果呈现,感到很幸运,也非常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

二是地利。我出生、成长皆在古都洛阳,工作之后经常会遇到铜镜资料。特别是2012年年底,当我从北京回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在文物库房内细致观摩并拍摄了一百多面战国至宋元时期的铜镜标本,真是大饱眼福。十三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宽广的学术平台,为我探究铜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在铜镜研究过程中,四川大学霍巍与黄伟两位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热心帮助,成为我在铜镜探索征程中强有力的学术后盾。

对古人而言,铜镜具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不仅能够映照容貌,而且能趋吉辟邪,譬喻德行。后人耳熟能详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段富有哲理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话还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引入诗作《百炼镜》:“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可照容颜变化,可鉴国家盛衰。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鉴若长河》 霍宏伟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视角

建构中华智慧谱系

——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 李瑞卿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下,文化承担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文化自信从哪里来?这不仅仅是主观世界的思想意识问题,而依然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应当面对当下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的时代性要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沿革因创,会通变化,才能真正创造出新时代文化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2017年年底由中华书局刊行,深受读者的喜爱。该书众位作者都是中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的名家,而主编先生的精心校勘和审慎态度,使我们对该书的敬意更深一层。该书更为永久的魅力却在于比较全面、科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包括中华思想的意蕴理路、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以及诸种通向致知明理的方法论。

“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张岱年先生对‘道’的理解可谓简洁明快,切中要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新高度。他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纲领的统帅下,当时还年轻的哲学家们进入到个案研究中,着重辨析气关系、情性观念、有无形神、动静体用,以及各种格

物致知的理论与途径,探求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缺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老子只反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有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证是时代的产物,他将人从上帝的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

个案研究有利于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肌理之中,作者对每个哲学家的把握都是斟酌再三,力求概括大略,窥其奥妙。比如论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以一以贯之”为题;论王弼以“得意忘言”“本末与体用”“名教与自然”为点;论张载则以“虚空为气”“凡象皆气”“神天化道”“一故神,两故化”为焦点。凡此种种,都能以问题为切入点,提纲挈领,擘肌分理,原原本本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对“道”的理解可谓简洁明快,切中要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新高度。他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纲领的统帅下,当时还年轻的哲学家们进入到个案研究中,着重辨析气关系、情性观念、有无形神、动静体用,以及各种格

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关于程颢与程颐,作者并未刻意比较,因为二程在理学上基本内容并无二致,书中申明其共同性:“他们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境界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但是,因为作者超常的抽绎与析理能力,我们所看到的程颢和程颐却是“同”又“不同”的,论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动静皆定”“天人一理”等为题,论程颐则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为天地之心”“道则自然生万物”等为题,精准地反映出程颢以发明本心为取向、程颐以居敬穷理为职志,分别开启不同理学路径的哲学史事实。可谓二程各表,同异自现——这是非同寻常的出色的哲学史叙述。本书精彩之处无法一一列出,这些当时的青年哲学家在张岱年先生的指导下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是可观的,这本书应当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初学者和爱好者可资借鉴,并可以信赖的阅读文本。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

全新视角感受老北京城门楼风韵

——《陈丽华的城门梦》序

□ 单霁翔

丁酉重阳,复见紫檀城门,甚以欣慰,作此篇,是为序。

“浑成紫檀今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和开发紫檀的国家之一。紫檀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因而极其珍贵,其纹理纤细浮动,变化无穷,故而极富韵味,其色调深沉,庄重大气,与宫廷生活与艺术渊源颇深。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丽华馆长带领其团队以紫檀等珍贵木料按照1:10的比例复建北京古城门,将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华美与紫檀雕刻的精巧融为一体,运用传统手工雕刻技艺,完全依照古建筑规矩做法,将老北京的各个城门“微缩”成一道道集历史、建筑、技艺、文化为一体的景观,不仅再现了北京古城门的原貌,更加重现了老北京城昔日的辉煌古韵。城门的复建是对一座城市历史的尊重,是这座城市独特而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不可否认,老北京城的记忆在我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而凝结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之美的古城门亦渐成了一种乡愁,成了老一辈人心中割舍不去的梦。老北京城是人类古代城市中的杰作,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承载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文化积淀,体现了中华文化“中正安和”的传统文化理念,“城”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与中国建筑的文化符号。老北京城素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指的是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但由于诸种原

因,老北京城门多数现已难觅其迹。历史遗迹的保护与文化文明的传承在今天同样刻不容缓。此次陈丽华馆长团队以紫檀博物馆中心精心选出近百名工匠,用名贵紫檀木、阴沉木为原料,手工建造老北京城门楼微缩景观,将紫檀雕刻艺术与不能浮动,变化无穷,故而极富韵味,其色调深沉,庄重大气,与宫廷生活与艺术渊源颇深。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陈丽华馆长带领其团队以紫檀等珍贵木料按照1:10的比例复建北京古城门,将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华美与紫檀雕刻的精巧融为一体,运用传统手工雕刻技艺,完全依照古建筑规矩做法,将老北京的各个城门“微缩”成一道道集历史、建筑、技艺、文化为一体的景观,不仅再现了北京古城门的原貌,更加重现了老北京城昔日的辉煌古韵。城门的复建是对一座城市历史的尊重,是这座城市独特而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据我所知,陈丽华馆长从事这门传统“微缩技艺”已有40余年,对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并持续开展对老北京各个城门的微缩复建工程。她对传统工艺的执着,造就了今天这一壮举。她曾八下印缅深山老林,为寻找这种珍贵木材付出了艰辛努力,带领着施工工匠人遵循古建筑原型,运用传统手工雕刻技法,将一座座北京城门“微缩”成独特的景观,再现了京城原貌。从2012年她的第一件作品“紫檀雕老北京城楼——永定门”完成始,到今天,中国紫檀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内九外七”,包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的制作。十六座城门楼完整地再现了老北京城门的原貌,中国传统木雕技艺的圆雕、透雕、镂雕也在榫卯技艺的



紫檀及阴沉木制宣武门城楼 选自《陈丽华的城门梦》

连接下,由方寸的细微构件组合成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展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美的深厚内涵。同时作为一项老北京城建筑规划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其对于促进北京老城保护、推动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弘扬北京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百年前,城门见证了王朝的衰落;一百年后,城门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老北京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仅要注重静态



《中华的智慧》 张岱年 主编 中华书局

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

这种努力是明显且有效的。比如,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和哲学史料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诸多新见。书中也特意关注了古代逻辑学家如公孙龙、公孙龙的著作和观念,特别留心中国哲学史中重要命题或焦点问题的辨析,将僧肇、范缜、法藏、慧能纳入研究视野,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书中也用心良苦地发掘中国哲学家们的理性觉醒和科学态度。正如前文所述,本书作者们并未陷入空洞的本性或本质就是这一类事物的根本规律与人类的道德原则合而为一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性即理也”包含着认为一类事物的本性或本质就是这一类事物的根本规律,这个思想在理论思维上是有意义的。”这种论述,是将对中国传统理学的解读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中。张岱年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建构了中华智慧的谱系,以“道”、理性精神来统摄,将中华智慧的体认纳入严肃的学理观照与高远的历史观照中,并将对中国特色人文精神的孜孜以求贯穿始终。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读者说

探寻

生命存在与文

尹相变

继《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之后,杨守森教授最近出版了《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一书,可谓在文艺学基本原理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其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存在是社会的、文化的,也是肉身的、生理的。其心理构成,除受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影响之外,生理机制亦必是重要根源。因此,只有深入人的生理层面,从生命密码入手,才能更为切实地揭示人类文艺活动的复杂奥妙。

这部著作的突出特色即是综合运用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注重从人的身体机制入手,并结合古今中外相关的艺术家个案及文艺现象,分别探讨了“生命之火与诗性之光”“身体形态与文艺创作”“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在本书《身体形态与文艺创作》一章中,作者指出,不同的生命个体,身体构成因素千差万别,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生命特征,并影响其精神个性,使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与心理趋向;在《性别与文艺创作》一章中,作者结合中外文学史上不少名家的案例,尤其是英国著名变性作家杰恩·莫里斯的切身体验及其作品前后的变化,证明人类不同性别之间的某些意识是难以完全相通的,必然存在阻隔。作者正是据此强调,作家、艺术家都应设法从自己的生命形态出发,把握自己的精神个性,顺其自然,率性而为,不可背离自我,旁涉它迁。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创作个性的扭曲或丧失,才能写出顺乎自己心性的人物,抒发出自己独特的内心,创造出卓尔不群的作品。作者从人类生命密码角度进行的分析探讨,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人类文艺活动的奥妙。

本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作者将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如基因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运用到文艺学的研究中。作者依据基因科学理论,结合对许多相关文艺现象的分析指出,基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文学创作的源泉,某些基因的性能也决定了人类的艺术形式或某些形式要素的生成,影响了艺术家的形式创造,维系了某些形式规则的稳定性。

本书中,作者对文学艺术功能进行了反思,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艺术,绝非通常所说的出于简单化的认识,教育、审美之类的,而是缘于命理与文化双重功能。前者主要表现在可以振奋人的生命活力,扩展人的生命空间,缓解人的生命苦恼;后者主要表现在可以激发读者对自由幸福的生活境界与纯正善良的人格境界的向往。正是依据双重功能,作者认为,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只有基于自己切身的生命感受,才不至于导致作品的枯燥空泛;又要有超越性的文化视野,才不至于导致作品的浅陋低俗。这一见解,无疑是符合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品的生成规律的,也有助于作家或艺术家创作出优秀作品。我想,这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根本意义所在吧。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